

碰撞·融合·发展

PENGZHUANG RONGHE FAZHANG
GE SAER DE WENHUA BIANQIAN YANJIU
《格萨尔》的文化变迁研究

臧学运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欧美〈格萨尔〉译介研究》（课题编号：
16CWZJ04）阶段性成果

碰撞·融合·发展

——《格萨尔》的文化变迁研究

臧学运◎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碰撞·融合·发展：《格萨尔》的文化变迁研究 /
臧学运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77-9777-2

I. ①碰… II. ①臧… III. ①《格萨尔》—文学研究
IV. ①I207.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2970号

书 名：碰撞·融合·发展：《格萨尔》的文化变迁研究

PENGZHUANG·RONGHE·FAZHAN
——《GESA'ER》DE WENHUA BIANQIAN YANJIU

作 者：臧学运 著

策划编辑：宋睿文

责任编辑：宋睿文

责任校对：宋睿文

装帧设计：刘 瑜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501号

邮政编码：130021

发行电话：0431-89580028/29/21

网 址：<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jlup@mail.jlu.edu.cn

印 刷：北京军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5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677-9777-2

定 价：49.80元

前 言

史诗《格萨尔》带着“世界第一长诗”“古代藏族社会的百科全书”的荣誉桂冠，成为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的千古绝唱。它历经千年，浸染着不同时代典型文化，融原始信仰文化、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于一体。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致使这部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了多种文化共存的风格。同时，作为“活形态”的史诗，《格萨尔》深深植根于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藏族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所以，《格萨尔》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再思考空间。

在每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中，总是或浓或淡地渗透着宗教信仰文化。而藏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宗教信仰自始至终作为一种主宰力量存在。无论是人类初民时期的原始宗教信仰、后来的苯教信仰，还是当代的藏传佛教信仰，宗教信仰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世代高原居民。所以，宗教文化对藏族，实在是一个复杂而突出的问题。《格萨尔》形象地记述了藏民族“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悠久历史的形成及其发展进程，因而也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社会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宗教演变轨迹——从人类最初的自然崇拜到由其演变而来的精灵崇拜、图腾

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从多神崇拜到由其发展而来的统驭众神之上主神崇拜乃至一神崇拜；从部落宗教^[1]到由其演化而来的民族宗教等等，所有这些在这部史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反映。所以，通过深入挖掘史诗《格萨尔》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文化土壤，强调史诗的文化生态环境，由此梳理《格萨尔》中所表现的比如以信仰山神、当方神、守舍神为特色的原始信仰文化，以煨桑祭祀、“三界”信仰为特色的苯教文化，以众生平等、轮回转世、化身思想为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并把重点放在文化的变迁上，尤其是史诗《格萨尔》在当代的发展上，将重心放在文化内涵及其对当代的影响的处理上。这样做，一方面以文化生态环境为背景，展示《格萨尔》不同时期的形态，理清发展脉络，从而获知其本质；另一方面探索《格萨尔》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内涵的体现，挖掘它对该学科的学术贡献和价值，尤其是当代藏族百姓在史诗的影响下仍然践行着各种民间形式的“活态”表达。比如浪迹高原的说唱艺人、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雕塑、格萨尔石刻、遍布史诗流传区的各种有形载体等，以及当下史诗的各种变奏如文学、影视、藏戏等等，无不展示出这部古老史诗的活力和魅力。

要探索史诗《格萨尔》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分析史诗在藏族文化史的地位和影响，就必须对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藏族文化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作一番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史诗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的历史联系”。和其他民族一样，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藏族先民从远古时期就在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第一章所述，史诗《格萨尔》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原始宗教文化、苯教文化

[1] 这样的提法不准确，因为事实上从内容到形式不能确立有别于其他宗教的部落宗教。但为了叙述方便，文章用这一称谓进行指代。

和藏传佛教文化。在这三种文化中产生、形成、发展的《格萨尔》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而事实上，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既论述了史诗中原始信仰文化、苯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这三种不同文化对史诗的影响。

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民族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敞开胸怀广泛吸收其他外来民族文化的标志。这种“敞开胸怀广泛吸收其他外来民族文化”的做法必然和本土文化产生冲突，在冲突中不断融合、发展，这也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兼容并蓄或兼容并包。

所以，依据宗教文化和藏族社会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史诗《格萨尔》中所体现的宗教文化，既不是单一的苯教文化，也不是单一的佛教文化，更不会感到错综复杂而难以下结论。就《格萨尔》是藏族社会的一面镜子，是藏族历史的一条大河来说，众说纷纭的《格萨尔》是苯教的抑或《格萨尔》是佛教的争吵就此可以停止。这种兼容并蓄性就是因为史诗流传的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远而形成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说唱艺人或搜集整理者的不同信仰、不同观念，都足以造成这种现象。史诗《格萨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三元文化的冲突、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元文化的融合变奏使得《格萨尔》到底源于苯教还是佛教的斗争失去了必要。

《格萨尔》主要是在以原始信仰与苯教信仰为主流文化与以佛教为外来文化的撞击中不断融合并发展的。这种独特魅力使它对当代藏族产生了深刻影响。格萨尔的各种有形载体成为当代藏族民众祈祷祭祀、消遣娱乐的场所；格萨尔相关的各种艺术形式，包括格萨尔唐卡、石刻、雕塑等丰富了藏族民众的精神世界；非遗视域下“史诗格萨尔传统”得到更好发展，各级政

府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大打“格萨尔”旗号以及格萨尔的当代成功转型，包括格萨尔文学、影视、藏戏等如火如荼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活形态”史诗的当下发展，表明了格萨尔文化影响着当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

总之，在“碰撞·融合·发展”的主线贯穿之下，把史诗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并把着力点放在史诗的当代发展形态和影响上，使《格萨尔》成为世界史诗中的范本，更增添了《格萨尔》的神秘与魅力。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格萨尔》与《格萨尔》学	2
第二节 研究背景	8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	18
第一章 史诗的文化生态环境.....	27
第一节 文化与宗教	27
第二节 《格萨尔》的文化生态环境	42
第二章 《格萨尔》中的原始信仰文化.....	60
第一节 《格萨尔》中的自然神灵崇拜	61
第二节 《格萨尔》中的动物崇拜	65
第三节 《格萨尔》中的图腾崇拜	72
第四节 《格萨尔》中的灵魂、灵物崇拜	78
第三章 《格萨尔》中的苯教文化.....	84
第一节 《格萨尔》中的苯教神灵系统	85
第二节 《格萨尔》中苯教教义的体现	89
第三节 《格萨尔》中对苯教仪轨的体现	91

第四章 《格萨尔》中的藏传佛教文化	99
第一节 《格萨尔》中的授记思想	100
第二节 《格萨尔》中众生平等、不杀生的佛教思想	105
第三节 在《格萨尔》中的轮回转世思想	107
第四节 《格萨尔》中的化身理论	111
第五章 《格萨尔》民间信仰的“活态”表达	115
第一节 当代荷马——《格萨尔》说唱艺人	116
第二节 藏族民众生活中的《格萨尔》民俗	124
第三节 藏族民众生活中的《格萨尔》艺术	136
第四节 藏族民众生活中的《格萨尔》有形载体	145
第六章 非遗视域下的《格萨尔》	150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模式现状评析	151
第二节 《格萨尔》的非遗属性	153
第三节 《格萨尔》的非遗保护与发展	155
第四节 格萨尔大王狮龙宫殿在非遗保护中的借鉴意义	158
第七章 当代藏族人的格萨尔信仰——以果洛为例	161
第一节 以果洛为主要调查对象的缘由	162
第二节 当代藏族人的格萨尔信仰现状	164
第三节 变动中的格萨尔信仰	166
第四节 当代藏族人格萨尔信仰特点	168
第八章 《格萨尔》的当代转型	170
第一节 《格萨尔》与当代文学	170
第二节 《格萨尔》与影视	178
第三节 《格萨尔》与藏戏	184

第九章 《格萨尔》文化内涵及其变迁的文化思考	189
第一节 三元文化的融合变奏	189
第二节 史诗的当代表意功能与特征	194
第三节 史诗的传承与发展	207
结 语	215
参考文献	216
附录一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的保护与传承的调查问卷	222
附录二	
当代藏族人的格萨尔信仰观调查问卷	224
后 记	228

绪 论

以藏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藏学，自17世纪随着那些探险家和传教士们介绍到世界以来，已经是一种颇具世界影响力的学科，不少的仁人志士为这一文化的研究、翻译、诠释、教育、传播、发扬光大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随着藏学的进一步升温，藏族文化的研究仍将继续成为热点，所以，有人讲21世纪将是藏学的世纪。但是一直以来人们有一种片面的理解，认为藏文化就是一种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毋庸置疑，宗教在藏族文化和藏族社会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是全部。藏学专家石硕曾指出，“除宗教外，藏族文化中尤其是在藏族广大民间还存在着以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为核心价值的《格萨尔》英雄史诗。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修正、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两个极，正是这种不同的两极，才使藏族文化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1]所以，开展对《格萨尔》文化的研究，一方面要研究作为口传文化、民间文化代表的《格萨尔》，另一方面要专注研究贯穿《格萨尔》始终的主线，即藏族的宗教文化内涵演变，尤其要研究《格萨尔》文化内涵的变迁形式，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把藏文化推广至全球，让世界人民全面、正确了解原汁原味的藏文化，热爱藏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在全球的文化软实力。可以说，这一选题把这些问题巧妙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浑然一体。要全面的展开研究，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格萨尔》和格萨尔学进行简要的介绍。

[1] 石硕.《〈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J].西藏研究,2004.4:87

第一节 《格萨尔》与《格萨尔》学

史诗是一种民间叙事诗，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形象化的民族史。它作为一种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史上，都有一批相当成功的作品。比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之根》并称为欧洲三大史诗。学术界对于国外史诗，历来研究非常之多；而在中国由于受黑格尔的论断“中国无史诗”的影响，研究历来颇少，只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才开始注意。为此，笔者试图以我国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为研究对象，挖掘史诗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发展形态，为史诗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一、《格萨尔》概述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历代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歌谣等其他体裁的民间文学基础之上，用集体智慧和才华创作出来的一部集藏族文学、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民风民俗、宗教等众多学科为一体的大百科全书。^[1] 它卷秩浩繁、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是藏族人民对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记忆，享有“东方的伊利亚特”，^[2] 全世界最长的^[3]、活形态的史诗^[4]等美誉。

[1] 平措.《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1

[2] 1776年,俄国帕拉斯在圣彼得堡发表文章,把格萨尔称作是“中国的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

[3] 格学专家王沂暖教授曾不厌其烦地数过43部藏文史诗的诗行,达257520行。据不完全统计,藏族《格萨尔》至少有120多部,达150多万诗行,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100倍、《奥德赛》的125倍、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7.14倍、《罗摩衍那》的31.25倍。

[4] 当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史诗大多已被文字“固化”在纸面上时,《格萨尔》还在被艺人说唱,还有新的部本在不断产生,故而它是一部真正的活形态史诗。

《格萨尔》的产生和藏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藏族进入了鼎盛时期。9世纪以后，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互相兼并掠夺，生产横遭破坏，苦不堪言的民众向往吐蕃盛世，盼望能有一位大智大勇的英雄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于是，“格萨尔”便来到了人间。

史诗讲述了格萨尔的一生：格萨尔本是天上主宰世界的白梵天王第三个儿子。白梵天王看到下届鬼蜮横行，生灵涂炭，便派格萨尔降生人间，做了岭部落的首领。格萨尔智慧非凡、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一生南北征讨，除暴安良、抑强扶弱，最后完成了降妖伏魔、安定三界的神圣使命，返回天国。这一故事脉络用民间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话来概括，就是：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地狱完成业果。史诗的整个脉络可以分为天界篇、征战篇、地狱篇。天界篇通常由《花岭卜筮》《英雄降生》《赛马称王》三个分部本组成。这一部分主要叙述了格萨尔从天界来到人间之前的人世间妖魔横行，灾难连绵，黑头藏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神们看到这一场景，心生怜悯，随后众神诸议，指派神子到人间拯救的过程；以及神子借腹投生于生性温柔、贤惠善良的龙女果萨腹中的情形；神子在艰难困苦的人世间如何显示非凡的本领，最终参加以王位和美女为注的赛马盛会并一举夺魁登上岭部落首领宝座的具体过程。征战篇是史诗的核心部分，主要描写了格萨尔带领岭国百姓降妖伏魔、南征北战、平定四方、在人间建功立业的过程。史诗艺人和学者普遍认为在这一部分当中包括《北方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和征服其他十八大宗^[1]的战争。地狱篇是格萨尔的结尾部分，主要由《地狱救母》《地狱救妻》两个部本组成。它主要描写了格萨尔前往地狱救回自己的生母果萨和王妃阿达拉姆后，把王事托付给侄子扎拉，自己重返天界的过程。

相传历史上的格萨尔人物原型，出身于四川德格阿须草原，成长于青海

[1] 每一宗为一个部落。

果洛玛域。史诗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故事主人公格萨尔由人到神，融入了藏民族传统的宗教思想观念，充满了神与神话的色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格萨尔》史诗由少到多，由简到繁，逐渐发展，不断丰富。它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演变，代表了藏民族文化成就和发展的路程。因此，《格萨尔》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是学术界研究藏族的社会状况、经济生活、历史文化、民族交往、军事战争、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文学艺术的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

《格萨尔》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格萨尔》学：先后召开过八届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1]；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格萨尔”千年纪念，成为我国唯一受此殊荣的国际文化项目；2006年，《格萨尔》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国“《格萨尔》史诗传统”又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伴随着这一系列殊荣与成就，格萨尔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成为藏文化研究中一支重要的代表。

二、格萨尔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格萨尔》经过藏族和各相关民族^[2]人民的创造、演变和本民族化之

[1] 这六届分别是：1981年11月在四川成都、1991年8月在西藏拉萨、1993年7月在内蒙古锡林浩特、1996年7月在甘肃兰州、2002年7月在青海西宁、2006年7月在甘肃玛曲、2015年9月在四川成都、2016年8月在呼和浩特分别召开。

[2] 《格萨尔》除了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的藏族聚居区广泛流传之外，还在与藏区毗邻的周边地区及相距较远的内蒙古、新疆等其他民族地区流传，甚至在毗邻我国的拉达克、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蒙古、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及苏联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国家和地区亦有流传，并同上述地区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普米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巴尔蒂人、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为本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独特形式的民族史诗。

后，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丰富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同时，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给人类的史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人类文化群山之中耸立起一座高峰，从而与世界著名史诗相媲美。

顾名思义，格萨尔学是以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学科，是一门边缘、交叉的国际性新兴学科，是在20世纪末叶才形成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的。就藏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而言，历史上，广受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因为受到了以僧侣贵族为代表的当权者的排斥压制，所以这样一部在民族历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百科全书却一直未能迈入人类艺术的殿堂。史诗说唱艺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虽然他们浪迹于高原各地，把辽阔的牧场、农村当作自己说唱《格萨尔》的舞台，但是在民族的重大节日，在庄重的场合却不曾有过他们的一席之地，甚至受到驱逐^[1]。这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给《格萨尔》和它的主要创作者、传承者艺人们所造成的悲剧，也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给世界文化和藏族文化所造成的悲剧。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如何做好格萨尔学的学科建设，是摆在所有格萨尔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资料建设、理论构建、人才培养是一门学科建立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格萨尔》和说唱艺人迎来了春天，改变了他们的历史命运。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格萨尔》的抢救、搜集、整理工作，专门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广大的藏族、蒙古族等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抢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当时曾搜集到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七十多部，除去异文本，共为三十多部。青海省文联组织社会力量，将这些资料全部翻译成汉文，铅印成册，约为一千多万字。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翻译出版工作，在藏族历史上，只有大藏经的翻译编纂工作可与之相比。^[2]正当抢救、搜集工作顺利进行之时，这一工作遭到了“左”的错误

[1] 这里主要指历史上有艺人在格鲁派寺院周边说唱《格萨尔》时受到僧侣驱逐的现象。

[2] 降边嘉措.格萨尔的历史命运[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10

路线的干扰和影响而被迫停止。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格萨尔》被称作“大毒草”，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艺人们也遭受到了严重打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在广大藏族地区又出现了一次《格萨尔》热，不但出版了一些《格萨尔》部本，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地的广播电台也专辟《格萨尔》栏目，说唱艺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呈送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1981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在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对《格萨尔》的研究，《格萨尔》应成为一门学科”。^[1] 我国早在1983年就开始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将其列入了国家级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很快，“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的报告》两份通知先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随之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相关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2]，统一开展对《格萨尔》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译介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格萨尔》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格萨尔》工作的进一步拓展，为90年代初的具有中国特色《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199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格萨尔学集成》^[3]首发式及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认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1] 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纪要[J]. 民族文学研究, 1981. 1: 2

[2] 为加强《格萨尔》的各项工作，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份设立了《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3] 该书由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编纂。截止到1998年5月，共出版《格萨尔学集成》五卷。

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格萨尔》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还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在抓好格萨尔学资料建设的同时，也要在格萨尔学研究中进行理论构建。王兴先研究员曾指出，“从《格萨尔》所描述的民族、语言、宗教、民俗、文艺、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心理等博大精深的内容实际出发，打开新的思路，从边缘、交叉学科着眼，建立民族格萨尔学、语言格萨尔学、宗教格萨尔学、民俗格萨尔学、文艺格萨尔学、历史格萨尔学、政治格萨尔学、经济格萨尔学、军事格萨尔学、伦理格萨尔学、心理格萨尔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构建格萨尔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1]这样一个学科体系的形成及建立是继“红学”^[2]之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又一伟大文化壮举，是对过去所谓“《格萨尔》在中国，而其研究在国外”之说的有力回击。

要如愿完成格萨尔学的资料建设，并要长期从事创造性的格萨尔学的理论建设，就必须培养一批老中青结合的高素质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北民族大学走在了前列。在加大培养攻读格萨尔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一方面，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成为主要基地。1998年开始招收以藏语言文学硕士点为依托，培养以格萨尔研究为方向的硕士学位人才，后来成功取得历史文献学《格萨尔》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现为中国史《格萨尔》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研究院又成功申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为格萨尔研究的深入开展培养了具有高学历的人才。

综上所述，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体系是由以下四大体系为基本构成要素的：

“1. 一支仍在说唱、创作、丰富、发展《格萨尔》，从而使这部伟大史

[1] 王兴先. 简论格萨尔学的学科建设问题[J]. 载于《格萨尔文化研究》[C]. 坚赞才让主编,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 3

[2] 红学是指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